

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

倪乐雄·著

从陆权走向海权的历史必然

我们现在处于怎样一个时代？

海洋国家的繁荣富强总是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强大成正比的。强大的海军保障国家财富的积累，而财富丰足反过来保证了海军的强大。两者互相支撑形成良性循环。这种商业与海军的良性互动模式贯穿了古希腊的科林斯到今天的美国，是历史提供的且被反复证明的繁荣富强最佳模式。

海军越强大，本土越安全

强大的海军可以在海上歼灭入侵之敌，从而大大地减轻陆军的负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承担本土陆军的功能。与其说『海权拱卫陆权』不如说本土陆权的功能部分地转移给海权。因此，对海洋国家来说，不存在海权与陆权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而是在整个国防体系运作中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随战场空间变换二者如何协作的问题。

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

——从陆权走向海权的历史必然

倪乐雄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 / 倪乐雄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496 - 0241 - 4

I. ①文… II. ①倪… III. ①制海权—研究—中国
IV. 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4782 号

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从陆权走向海权的历史必然

本书著者 / 倪乐雄

总 策 划 / 王立中

责任编辑 / 黄 勇

特约编辑 / 刘非非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960 1/16

字 数 / 210 千

印 数 / 1—6000

印 张 / 13.75

ISBN 978 - 7 - 5496 - 0241 - 4

定 价 / 30.00 元

自序

文明冲突与中国海权

向读者交代一下自己研究海权的过程也许是必要的,顺便对自己的学术经历做一点回顾。

偶然的一个契机,使得我对于东西方战争文化的比较研究进入到海权这个领域。1996年秋,我在厦门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在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工作的王伟明先生筹备“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35周年大会”,邀请我参加并约我写一篇大会论文。我对郑成功没有专门深入的研究,只是一般生平和事迹的了解。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婉言谢绝,但细细一想,发现郑成功军事集团的生存依赖海洋而非陆地……

这打开了我同西方历史比较的思路,进而我发现,这是对东西方海权、海军进行深层比较的很好的切入口。

随着这一思路打开、研究的深入,十多年来形成了一些观点,下面逐一进行简述。

我从支撑郑成功海上割据势力的经济来源着手,得出郑成功的水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具有类似地中海文明性质的海军的结论。这种西方特点与中国历代水师由大陆农业经济支撑、作为陆权的辅助手段迥然相异。由此也发现中国大规模海军建设是没有

商业经济的动力来源的,是内陆农耕经济结构不能承受的。从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有赖于军事力量(主要是海军军种)的保障来看,进而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不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提出怀疑。

因为中国著名学者顾准^①先生曾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商团打天下的现象,而这在他看来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非常关键。显然,他当时没有注意到明末清初东南沿海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的海上势力的社会意义。

不过也难怪,明末清初东南海商集团的社会意义发现得比较晚,厦门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先生可能是最早指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海上势力蕴含资本主义因素的学者。1960年代初,傅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首先窥其端倪,以后该问题逐渐为学界所重视。至1980年代后期,林仁川^②先生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出版,表明该领域研究已趋系统成熟。

在郑氏海上势力同清廷的抗衡中,我注意到西方历史中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同样存在于东方,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过程,揭示了海权是台湾政治归属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历史规律同样能够在—

① 顾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为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政治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和《顾准自述》等。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特)和《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等。

② 林仁川,1941年10月生,福建龙岩人。1998年1月任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厦大中国海关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福建历史学会秘书长等职。著有《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大陆与台湾的渊源》、《福建财政史》和《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

定程度上解释今天的台湾现状。因为注意到三百多年来制海权与台湾政治归属的关系,我于十年前就判断:“不战、不和、不独、不统”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这不仅是研究战争史的结果,而且是在战争史研究中寻找范式和重视海权在历史中作用的结果。

于是,我把研究视野转到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中北洋海军的沉浮上。从根本上讲,北洋海军建设缺乏商业社会经济结构的支撑,北洋海军是与传统农耕社会经济相互排斥的,除了消耗农业社会的财富,不能像西方海洋国家的海军那样,成为为输出本国产品、输入国外原材料的对外贸易的社会经济结构服务的军事工具。

再从西方海权和海军的根源上考察,海权和海军是对外贸易经济必不可少的维护工具,因而是国家财富生产的成本投入。这是西方海洋国家海军能够持久存在的原始、强大的动力源。这就解释了为何中国古代虽有强大的海军,但却总是昙花一现,进而也就理解了郑和舰队为何会自动消失的历史现象。

当初研究海权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十多年,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向海洋国家转型。转眼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生活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马六甲海峡六、七成的货轮都与中国有关;官方一系列对外贸易的有关数据,包括依赖对外贸易直接提供就业岗位超过一亿人,这让我大吃一惊。而此时建造航空母舰的呼声从 1990 年代末以来,在社会上越来越强。我在读富勒(J. F. C. Fuller)对阿马达海战评述时,发现这种情形同 17 世纪英国走向商业贸易之路后,社会舆论呼唤强大海权的现象非常相似,可谓如出一辙。由此,我进一步考察了柯林斯、雅典、迦太基、罗马、威尼斯、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历史上的海权国家的兴衰,得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甚至我们的文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真正的“此三

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的结论。

我们已经抛弃了数千年来的“传统内向型农耕经济结构”，变成了“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数千年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国家海上生命线”问题破天荒地出现了。我们正从过去传统的农耕国家变成了现代海洋国家，我们和古代的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现代的英美一样需要强大的海军。

我感到：当人类在创造历史时，同时也是历史规律的奴隶。为此，我将历史上海权发生的模式总结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一旦生成，必然召唤强大的海权。”我相信这一历史模式几乎概括了历史上所有的海权现象。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解释和论证中国为什么需要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从传统陆权走向现代海权的同时，我感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转型，从根本上是来自生存方式的变化，生存方式的转型将导致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伦理道德、法律、风尚习俗、价值观等社会全方位的转型。甚至大学里“文史哲”传统主干专业的边缘化和没落、“经法外”（经济、法律、外语）成为主流专业和时兴都由此而来。这就好比一个来自内地乡村的农民进入大城市生活，成为商人或企业职员，因谋生方式发生了变化，他的人生追求、事业目标、知识结构、价值判断、为人处事、交往环境和日常琐事等将彻底发生变化。

换言之，社会全方位转型都是围绕生存方式转型而展开的，追求海权仅仅是国防军事方面的转型而已。由此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发生的转型期种种变化和人们的各种困惑。

研究海权还可以从宏观高度理解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军事史的一些现象。比如抗日战争时，两次淞沪抗战的失利、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的开辟、中日两军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战略僵持

的形成等等,都是和海权密切相关的。

在考察了两千年多年西方海权的历史后,我发现与海权连为一体,或者说孕育海权的母体——海洋文明往往是历史的火车头,也是每个历史阶段繁荣富强的最佳模式。

海洋文明社会开放、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政治民主、对外交流频繁、生产技术先进、社会总体效率高,比如迦太基、雅典、威尼斯、荷兰和英国等。

从另一方面看,陆权强国一旦再掌握了海权就如虎添翼,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这方面的典型是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美国,而反面的例子是蒙古帝国、法国、德国和前苏联。

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当代和未来。虽然历史的表象千变万化,但历史的原则不会轻易改变。海权的重要历史原则之一是: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一旦生成,必然召唤强大的海权。

“美国为何需要全球军事存在?因为我们的商业利益遍及世界。”美国第七舰队的宣传手册开门见山道。

美国人的逻辑和古希腊最早创立海军的柯林斯城邦如出一辙,而公元前494年雷德岛海战前,希腊联合舰队指挥官菲奥卡安·狄奥尼修斯发出的战斗口号是:“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做自由人,还是要做奴隶,而且是逃亡的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决定关头了。”

1905年日本与俄国对马海战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发出的战斗指令是:“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奋励努力。”

时间相隔两千三百九十九年,空间相差万里之遥,海上会战的战斗口号竟如此一致,都把海上决战视为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战。这种巧合深刻地揭示了海权、海军的盛衰决定海洋国家命

运的历史法则。

中国正在从传统农耕国家向现代海洋国家转型,海权战略的选择不仅是国防选择,而且是一种未来文明形态和国家前途的选择。

目前中国海权战略选择最大的困惑是: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或曰“全球化时代”,似乎有摆脱霍布斯“丛林原则”,而向康德“永久和平”进军的模样。这种模样的可靠性如何,没有人能够回答。于是我们陷于左右为难的困境,而困境中的选择只能是做好两手准备。

最根本的原则是:中国的海权战略既能对付霍布斯时代卷土重来,又能迎接康德永久和平时代的降临。

当历史的航船尚未驶入永久和平的港湾,中国海权战略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是经济的、切实可行的?

窃以为可考虑借用核威慑战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做法,即与潜在对手抗衡时,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能够做到“海上生命线相互确保切断”。

这种战略选择对世界和平不存在威胁,在自身不追求海上霸权的同时,也不憋屈于他人的海上霸权;在约束他人侵犯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约束。

“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历史上西方地中海文明滋生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海上霸权的最根本的原因和土壤,中国在成为海洋国家后能否摆脱这千年的“历史宿命”?

这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安危福祉和世界和平的大问题。

倪乐雄

2011年3月26日于上海

目 录

自序 文明冲突与中国海权	1
21 世纪对海权的沉思	1
海权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17
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	
——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	29
海权与中国的发展	57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角度看郑氏水师	
——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	69
在郑成功水师的背后	89
历史“长时段”与台海局势	93
北洋舰队战斗队形与战术火力再探讨	
——“夹缝雁行阵”：最糟糕与最合理的怪异组合	99
农耕社会军事思维的超越	
——儒家战争观与现代军事技术之间的艰难对话	122
20 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思	136
中国海权战略的困境	183
文明转型与中国海军战略	197

Discussion about the Northern Fleet Battle Formation and Tactics Fire — the Worst and Most Reasonable Combination	99
Beyond the Military Thinking of Agricultural Society — Difficult Dialogue between Confucian War Views and Modern Military Technology	122
Reflections on the China's 20th Century Military Modernization	136
The Plight of China's Sea Power Strategy	18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Naval Strategy	197

Civilization Transition and China's Sea Power

Contents

Prefac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China's Sea Power	1
The Reflec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Sea Power	1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Sea Power	17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from Land Power to Sea Power	29
Sea Power and China's Development	57
The Study of Zheng Chenggong (Koxinga) Nav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a Power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 And Rethinking of the Roots of Capitalism in Ancient China	69
The Nature of Zheng Chenggong Navy	89
Long Term History and the Taiwan Strait	93

21 世纪对海权的沉思

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家安全观念将有一个性质的变化,国家安全必然从本土扩展到本土以外地区。现在中国在进行社会转型,内向型经济变为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一旦和人家作战,一旦丧失海上生命线,就会岌岌可危。

应该得出的结论应是:中国正在成为海洋国家,中国的国防必然地要从传统的陆权主义走向现代海权主义,从而成为一个海权国家。

一、海权的概念以及海权诞生的历史原因

海权的定义应该怎么下?现在有人说要打破海权概念军事上的局限,应该有法律的介入,道义的介入,还有人把海洋的运输、海底资源开发也放进海权概念里。原先的概念是一百多年来约定俗成的,是学术术语。理论的概念只有在不得不改变的时候才有改变的必要,现在我们在运用约定俗成的海权概念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问题,完全能够解释现有的现象,而重新定义只会引起学术研究的混乱。比方说,后人在理解海权概念时会增加一种麻烦,首先要区别 21 世纪之前的海权仅仅指海上军事力量,21 世纪开始后的海权概念除了海上军事力量以外还包括国际道义和国际法的内容,或者海洋经济开发和海底资源保护等内容。学术创新是需要的,但为了刻意追求创新,结果既未开创出什么新东西,反而破坏

已有的基础,将原本清晰无误的常识弄得模糊难辨,这种学术态度是不可取的。

比如:“国家拥有强大的海权就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底资源和海洋经济的开发”这样一个表述,要比“国家拥有海权中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就能有效地保卫海权中的海底资源和海洋经济开发”简单明确得多。如果把海上军事力量和海洋资源开发归并到“海权”的概念里,那么当一个国家的海军很强,海上经济开发力量却很弱时候,这个国家的海权力量怎样评估?是海权强国还是海权弱国?

有人甚至把捕鱼、天然气开采等海洋产业归并到海权概念中去,把海军当作海权的军事部分,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须依靠海权,还是要发展陆权等等,简直混乱到了极点。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房地产也成了陆权的一部分不是?如果陆权仅仅指陆军力量,“发展陆权”的说法不是和目前国防建设的任务南辕北辙?

所以,创新海权的概念,我认为没有必要;实际情况是创新不足,混乱有余。

因此,我认为海权的定义就是已在长期历史实践基础上被人们所认可的:“一个国家运用军事手段对海洋的控制力。”运用这一明确的海权定义,并作为学术思考的基本概念,一点儿也不会妨碍对当代现实的分析。如果用所谓的“创新”的海权定义作为分析的工具,我们将在以往的历史现象和现实面前寸步难行,我们将无法同以往的学者进行对话。

海权是怎么发生的?中国的海权意识,在我看来,比西方晚了两千多年。

海权诞生的第一个要素是面对海洋,且要有出海口。新疆塔克拉玛干内陆沙漠里不会产生海权意识,沙漠里只有骆驼,不会有海权思想。但面对海洋未必一定会产生海权意识或海权实践,像

古代中国。那么长的海岸线,足有 18 000 公里也没有促使海权思想和实践的出现,因为中国的海岸地理形态不同于环形的地中海形态,由于同周边海洋国家距离遥远和古代航海技术简陋,加之文明发展的不对称,古代中国无法同周边海洋地区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对等交流,因而本质上属于内陆世界的国家,大海同高山一样成了隔绝外部世界的天然屏障。

所以,要使海权得以发生的第二个要素是,生存必须依赖于对外贸易。不做生意的民族不会有海权,但做生意未必一定产生海权。像我们有晋商、徽商,他们那里没有产生海权。

上述两个要素同海权的关系是“有之未必然,无之则必然”。也就是说,具备这两个条件不一定产生海权,没有这两个条件一定不会产生海权。

我们发现只有中国东南福建的海商那里,才有海权意识和海权实践的发生。这就涉及到产生海权的第三个要素:对外贸易必须经过海洋,这样就出现了“海上交通线”、“海上生命线”的保护问题。而不是陆路,如西北的丝绸之路等等。

第四要素必须是霍布斯时代,而非洛克时代或康德的永久和平状态,也就是人类还没有走出崇尚暴力的时代。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关系”,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样地,自然状态下的国与国关系也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主宰着这个时代。大家要看看吴思的《潜规则》一书。他认为,世间的第一法则是力量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是一条元规则。

所以,只要战争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就一定存在着国家用军事力量保护海上生命线的问题。

起源即本质,从古代最早的海权现象中,可以发现构成海权的几个要素。古代世界的海权都发生在航海贸易民族和地区。

公元前 2000 年—公元前 1400 年的米诺安时代中后期,克里特岛可能是第一个拥有实际意义的海上霸权,他们在埃及、叙利亚、西西里岛和爱琴海群岛之间进行贸易。古希腊时代的诸多城邦都从事航海贸易和海外殖民运动,科林斯城邦是比较早的海上军事强国,它为了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希腊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海战是科林斯同科孚岛之间的海上会战,时间是公元前 664 年。与波斯帝国首先发生冲突,并在来德海战惨败的爱奥尼亚人,也是从事海上贸易。波斯帝国的海军实际由腓尼基舰队组成,腓尼基人是往来于地中海的生意人。迦太基帝国的祖先也是腓尼基人,他们最初在今天的突尼斯角附近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并为了保障帝国的繁荣而建立起强大的海上霸权。

二、海权对于陆权的优势

有人认为,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在古代并不明显,陆权比海权更重要。我以为,这是对历史缺乏起码的常识,并且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很大缺陷。在希腊、罗马时代,海权对于陆权的优势就十分显著地表现出来了。

马拉松会战,便是雅典从传统的陆权主义走向海权主义在思想上的转折点。马拉松会战虽以雅典胜利告终,但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海上机动却让雅典军队在陆上疲于奔命,险些造成首都陷落。

此后不久,雅典发现了一个银矿,他们召开大会投票决定如何处置这个银矿。首先,他们决定把这笔财富用于军费开支,不分到每个公民手中。第二,大家投票表决建立什么军种,是前所未有的海军军种还是传统陆军,后在塞米斯托克利倡议下,决定建立海军军种。

历史证明,这一决定是英明的选择。在后来对抗波斯的人侵

时,波斯大军沿着爱琴海的海岸线进入希腊,雅典陆军节节败退,雅典军民已放弃本土,全部撤到萨拉米斯岛上,正准备举国迁往西西里。就在这时,著名的萨拉米斯会战爆发。雅典新建的海军打败了波斯舰队,波斯陆军的后方供给线立即受到威胁,其强大的陆军不得不放弃陆上的胜利,从希腊半岛撤退。这一战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于海上胜利而改变了世界进程”。

近代海权的产生,我们以英国为例。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城市扩张,使得英国的生存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经济。比如以农业为例:在十亩土地上的农作物同在十亩土地上的的一座工厂或酒店的利润收益要相差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十亩耕地必然用于工商业开发,这十亩耕地必须提供社会的粮食就从工厂或酒店的丰厚利润中挪用极少一部分,从海外进口。国家的财富迅速增长,人们生活变得富裕,但同时也派生出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即海上生命线。进口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海上交通线一旦被切断怎么办?自然就要建立和维持一支强大的远洋作战的海军,近海防御性质的海军便不行。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英国人为什么非常“霸道”,要保持强大的海军,为何在一战前实行海军“双强标准”(即两个次等强国的海军吨位相加不能超过英国海军的总吨位),为何对德国海军总吨位要达到自己的60%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以致于同原来头号对手俄国达成一揽子谅解,把德国视为主要敌人。英国自从工业革命的“圈地运动”以来,经过了“羊吃人”阶段后耕地日益减少,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光是英国的粮食就完全依赖进口。拿破仑也好,希特勒也好,始终想切断英国的海上运输线,因为一旦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三个月,英伦三岛上的人就会陷于饥饿,其余物资需要姑且不论。